

农地流转综合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①

程 飞^{1,2}, 信桂新^{1,2}, 魏朝富¹, 杨朝现^{1,2}

1. 西南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 重庆 400716; 2. 重庆蓝德国土资源研究开发中心, 重庆 400716

摘要: 合理评价不同农地流转模式的实践效果对完善农地流转制度、有的放矢地推进农地流转具有重要意义. 分别从经济、社会、环境 3 个方面选取 10 项指标, 构建了农地流转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并以成都郫县为研究区进行了实证. 结果表明, 综合绩效由大到小依次为: 股份合作制模式(84.33), 集体参与模式(37.37), 农户自发模式(22.54); 从单一绩效来看, 股份合作制模式最佳, 集体参与模式的环境绩效最差, 农户自发模式的社会绩效最差. 研究认为, 不同的农地流转模式因其适用条件不同, 故各有其优缺点, 因地制宜、规范有序、循序渐进、统筹兼顾是推进农地流转、获取绩效最大化的主要策略.

关键词: 农地流转; 绩效; 评价体系; 模式; 郫县

中图分类号: F301.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68(2015)01-0110-08

统筹城乡发展, 离不开土地及其他生产要素的统筹协调配置^[1]. 实践证明, 农村土地流转对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3]. 而合理地评价不同农地流转模式的实践效果对于完善农地流转制度、有的放矢地推进农地流转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 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农地流转绩效展开了研究. 多数研究认为, 有序规范的农地流转对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增加农户收入具有明显的正效应. 如陈志刚、曲福田通过细化产权的权利束、考虑权利主体之间的差异性, 认为农地的使用权稳定性越高, 农户就更愿租入农地, 增加对农地的投入, 从而提高农地产出率, 并进一步指出农地产权内部权利的构成以及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会对农业绩效产生影响^[4]. 曹建华、周滔等通过引用农地供求理论模型, 以中部 6 省为案例, 对土地流转带给供求双方的福利进行了估算, 结果表明, 农地同其他要素一样, 合理的流转有助于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获得规模效益^[5-6]. 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 农地流转并不一直都是正效应. 如俞海、郜亮亮等通过构建模型定量研究了农地产权稳定性是如何影响农地土壤肥力与产出率的变化, 其结果表明, 不规范的短期农地流转不利于保持土壤的长期肥力, 也会降低土壤的可持续生产能力, 进而影响农地的产出效率^[7-8]. 王春超以中国 17 省份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 从农户家庭经济资源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 研究表明, 农村普遍存在的具有短期性和随意性特点的非正式契约形式的农地流转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9].

总体而言, 已有对农地流转绩效的研究, 虽有独到之处, 但也难免存在偏颇, 或是定性有余而定量不足, 或是仅对某一方面进行量化评价, 缺乏对具体流转模式的具体分析, 以及综合性的效应分析. 因此, 科

① 收稿日期: 2013-11-12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乡村土地流转与资源整合关键技术与示范”(2013BAJ11B02).

作者简介: 程 飞(1986-), 男, 河南周口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土地利用与综合整治研究.

通信作者: 杨朝现, 博士, 副教授.

学构建农地流转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客观评价不同流转模式的综合效应,是一项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的工作.基于此,本文在农地流转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以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市郫县为研究区,对不同农地流转模式的综合绩效进行了评价,期望能够为政府的农地流转政策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四川郫县位于 $103^{\circ}42' - 104^{\circ}2'E$ 、 $30^{\circ}43' - 30^{\circ}52'N$,地处川西平原腹心,属于成都城乡布局的第二圈层,幅员面积 437.50 km^2 . 2012 年末,全县总人口 51.87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29.66 万人.地区生产总值 325.59 亿元,综合经济实力在全省排名第 9 位,三次产业结构 $5.8:60.4:33.8$,全年粮食总产量 9.31 万 t,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 847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12 595 元,分别较 2007 年增长 89.67% 和 110.06%. 近年来,按照成都市城市功能向郊区转移的整体部署,大量企业入住郫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有效转移,农业产业化经营得到积极推进,依托蔬菜产业的发展,郫县被列为四川省现代农业产业基地重点发展县.

为加快农业结构调整,高效利用农村土地资源,发展现代农业,近年来郫县按照“依法、有偿、自愿”、“流转程序规范化、流转主体多元化、流转方式多样化”等原则,建立了县、乡两级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服务中心和农村土地承包及流转纠纷仲裁委员会,整合农村土地资源,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土地规模经营.截止 2012 年底,全县耕地流转面积累计 $13\,080 \text{ hm}^2$,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 63.70%. 其中,以转包和出租形式流转 64.02%,以反租倒包形式流转 18.04%,以土地入股形式流转 8.65%,以转让和互换形式流转 5.92%,其他形式流转 4.37%. 流转土地实现规模经营面积 $11\,980 \text{ hm}^2$,占流转总面积的 91.60%. 农地流转带动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目前已形成无公害蔬菜、优质粮油、珍稀食用菌和特色花卉苗木等优势农业产业,实现了农村经济和各项事业的较好较快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由此郫县也先后被列为了国家生态示范区、全国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区、中国盆景之乡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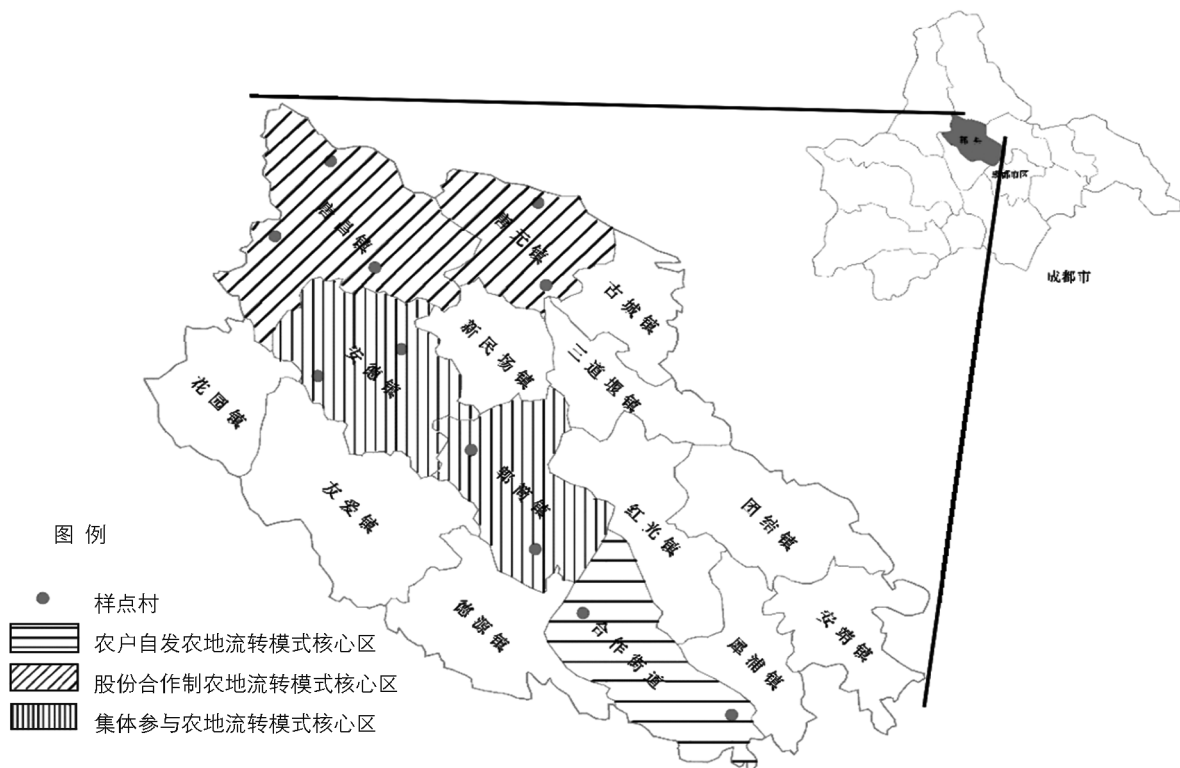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区位置及调查样点分布图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数据来自研究区的实地调研问卷、部分农业企业提供的资料和郫县统计年鉴。资料收集和调查工作开展于 2013 年 7 月 5 日至 2013 年 8 月 21 日。笔者在当地政府的指导下, 选取了研究区农地流转规模、形式、效果等较具有代表性的唐昌镇(战旗村、先锋村、平乐村)、安德镇(泉水村、安龙村)、郫筒镇(中心村、晨光村)、唐元镇(青杨村、锦宁村)和合作街道(前锋村、玉龙村)等 5 个镇街共 11 个村进行了抽样调研, 对农户、大户的农地流转方式、经营规模、种植结构、投入产出、收益等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和深入访谈。调查过程中, 一是收集了各乡镇有关农地流转的总体情况资料, 二是采用了入户访谈与问卷调查形式了解农户土地流转情况, 三是通过深度访谈向较有代表性的农地流转大户了解流转土地的经营情况。调查共获取 154 份问卷, 整理筛选后有效调研问卷 136 份, 有效问卷率 88.31%。经对调查对象和调查问卷统计分析, 出租与土地作价入股是研究区农地流转采取的主要方式, 也存在反租倒包、转包、代耕等其它农地流转方式。为综合评判研究区不同农地流转模式的综合绩效, 根据对调查数据的整理, 将研究区的农地流转模式划分为以出租为主的农户自发农地流转模式(简称农户自发模式)、土地作价入股的股份合作制农地流转模式(简称股份合作制模式)和以反租倒包为主的集体参与农地流转模式(简称集体参与模式)。

据调查, 农户自发模式中, 土地流转较为零散、规模较小, 流转后往往沿袭原有的种植结构和耕作制度, 土地产出效益与流转前相差不大。与之相比, 股份合作模式有显著不同, 以战旗村为例, 该村农户以承包地或带资入股方式成立的蔬菜股份专业合作社, 现有社员 362 户, 实现农地流转 91.13 hm²。该合作社主要发展无公害蔬菜, 并不断引入新品种、新技术, 建立了蔬菜育种大棚, 蔬菜品质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从而确保了社员的利益, 农地每年毛收入约为 12.98 万元/hm², 扣除成本、管理等费用, 农地年纯利润约为 9.48 万元/hm²。该合作社收益分配主要根据占股份的多少来分红, 其中, 入股农户除了获取 1.29 万元/hm² 的保底租金外, 还可获得超出保底部分的 50% 用于二次分红, 另一部分收益归合作社所有, 用来支付管理费、引进新技术、新品种及购买相关机械。集体参与模式与股份合作模式的运作方式不同。走访成都榕珍菌业有限公司、第 5 季投资有限公司等几家龙头企业发现, 该模式是以村集体为中介的反租倒包流转案例。以成都榕珍菌业有限公司为例, 公司实现土地流转 80.33 hm², 涉及 541 户农户。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公司, 除了每年获得固定租金外(田 12 750 斤稻谷/hm², 土 10 500 斤稻谷/hm²), 还可以进入公司从事劳动获得每月 2 000 元左右的报酬。农业龙头企业的进入, 不仅带动农民创收, 同时也推动了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2.2 研究方法

2.2.1 农地流转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农地流转绩效是指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 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前提下, “农地流转”因素的变动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结果的影响^[10]。科学的选取评价指标对评价农地流转这一因素所引起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效果至关重要。基于此, 本着系统性、科学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 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11-15], 本文从经济、社会、环境 3 个方面筛选出 10 项指标, 构建了农地流转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表 1), 拟对研究区农地流转绩效进行评判。

这里的“农地”指耕地, 即农户的承包地。农地流转即为农户承包地的流转。评价指标体系中, 经济绩效主要反映农地流转对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效果, 在此选取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单位土地投入产出比变化、机械化程度变化、农地规模经营程度变化来衡量; 社会绩效主要反映农地流转对促进农村社会发展、改善农民生活的效果, 在此选取农户满意度、劳动力投入强度变化、农村恩格尔系数变化来衡量; 环境绩效主要反映农地流转对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地质量的效果, 在此选取化肥施用量变化、农

药使用量变化、水土流失面积变化来衡量. 为量化上述指标, 需要对规模经营的标准值加以界定, 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16], 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 本文选取单个业主经营承包地 0.67 hm² 作为规模经营的标准. 通过统计汇总调查数据, 得到 3 种农地流转模式的流转指标数据(表 2).

表 1 农地流转绩效评价指标

目标层	准则层	指 标 层	指 标 量 化 公 式
农地流转 综合绩效 (A)	经济绩效 (B ₁)	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率(C ₁)	流转前后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量÷流转前农民人均纯收入
		单位土地投入产出比变化率(C ₂)	流转前后单位土地投入产出比变化量÷流转前单位土地投入产出比
		单位土地农机使用变化率(C ₃)	流转前后单位土地机械使用额变化量÷流转前单位土地机械使用额
		农地规模经营实现指数(C ₄)	土地流转总面积中实现规模经营的面积÷土地流转总面积
	社会绩效 (B ₂)	该模式流转意向农户比率(C ₅)	总调查农户中愿意以该模式进行农地流转的农户数÷总调查农户数
		单位土地劳动力投入率指数(C ₆)	流转前后单位土地劳动力投入变化量 ÷ 流转前单位土地劳动力投入量
		农村恩格尔系数变化指数(C ₇)	流转前后农村恩格尔系数变化量÷流转前农村恩格尔系数
	环境绩效 (B ₃)	单位土地化肥施用量变化率(C ₈)	流转前后单位土地化肥施用变化量÷流转前单位土地化肥施用量
		单位土地农药使用量变化率(C ₉)	流转前后单位土地农药使用变化量÷流转前单位土地农药使用量
		水土流失面积变化率(C ₁₀)	流转前后水土流失面积变化量÷流转前水土流失面积

表 2 不同农地流转模式指标数据

流转指标数据	农户自发模式		股份合作制		集体参与模式	
	流转前	流转后	流转前	流转后	流转前	流转后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7 625	9 826	7 869	12 813	7 869	11 026
单位土地投入产出比/%	354	423	330	440	307	383
单位土地农机使用额/元	146	218	168	443	152	326
农地规模经营实现面积/hm ²	8.93	3.73	506.67	506.67	240.8	240.8
该模式流转意向农户数/户	136	64	136	125	136	108
单位土地劳动力投入量/工	12	16	15	60	12	10
农村恩格尔系数/%	48.36	46.21	48.21	41.13	48.53	44.13
单位土地化肥施用量/kg	18	29	22	20	19	41
单位土地农药使用量/元	30	41	31	34	31	56
水土流失面积/hm ²	0.63	0.54	32.02	11.75	17.34	9.22

注: 农地规模经营实现面积中, “流转前”数据为农地流转总面积, “流转后”数据为实现规模经营面积; 该模式流转意向农户数中, “流转前”数据为调查总农户数, “流转后”数据为偏向该模式流转农户数.

2.2.2 指标权重确定

由于不同评价指标对评价目标的相对重要程度不同, 因此科学地计算各项评价指标权重是评价结果客观、准确的重要前提. 考虑到农地流转绩效评价指标之间存在着反馈性和相互制约关系,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17-19], 对农地流转绩效评价指标赋予权重. 在已构建的农地流转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通过专家经验判断、反复征询按照“1—9”标度法, 构造判断矩阵, 求解农地流转绩效评价指标的权重向量, 并进行一致性检验(表 3).

从表 3 可见,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率(C_1)、单位土地投入产出比变化率(C_2)、该模式流转意向农户比率(C_5)等指标的权重相对较大. 指标权重值一定程度表明农地流转能否增加农民收入、能否提高单位土地产出率、是否获得农户支持等是影响农地流转绩效的主要因素.

2.2.3 综合绩效值的计算

在农地流转绩效评价中,以农户为评价单元,各评价指标值采用发生农地流转农户样本的指标平均值. 在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的基础上,将各评价单元的每一评价指标的初始值与其权重相乘,之后再行累加,得出农地流转的综合绩效. 计算公式如下:

$$F(w)=\sum_{i=1}^n[W_i\times\sum_{j=1}^m(W_j\times A_j)]$$

(1)

式(1)中 $F(w)$ 为农地流转综合绩效值; W_i 为准则层权重; n 为准则层的数目; W_j 为各指标权重; A_j 为各评价指标原始值; m 为单一绩效评价指标的数目.

表 3 农地流转绩效评价指标权重

指标层次	指标代号	权 重		
		W_{AHP}	AHP 一致性检验	综合权重
$A-B$	B_1	0.558 4	$\lambda_{\max}=3.018\ 3$ $CI=0.010\ 2$ $RI=0.58$ $CR=0.017\ 6<0.1$	—
	B_2	0.319 6		—
	B_3	0.122 0		—
B_1-C	C_1	0.413 3	$\lambda_{\max}=4.070\ 8$ $CI=0.023\ 9$ $RI=0.90$ $CR=0.026\ 5<0.1$	0.230 8
	C_2	0.292 2		0.163 2
	C_3	0.107 8		0.060 2
	C_4	0.186 7		0.104 2
B_2-C	C_5	0.443 4	$\lambda_{\max}=3.018\ 3$ $CI=0.010\ 2$ $RI=0.58$ $CR=0.017\ 6<0.1$	0.141 7
	C_6	0.169 2		0.054 1
	C_7	0.387 4		0.123 8
	C_8	0.412 6		0.050 4
B_3-C	C_9	0.259 9	$\lambda_{\max}=3.053\ 6$ $CI=0.029\ 9$ $RI=0.58$ $CR=0.051\ 6<0.1$	0.031 7
	C_{10}	0.327 5		0.039 9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流转模式单一绩效分析

本文依托典型案例访谈获取数据,结合农户调查问卷数据的整理分析,同时根据上述构建的农地流转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得到了农户自发模式、股份合作模式、集体参与模式的流转绩效(表 4). 从经济、社会、环境绩效单一层面对比分析 3 种不同农地流转模式,各单一绩效存在一定的差异.

表 4 不同流转模式单一绩效评价

流转模式绩效		B_1				B_2			B_3		
		C_1	C_2	C_3	C_4	C_5	C_6	C_7	C_8	C_9	C_{10}
农户自发模式	初始值	28.87	19.49	49.32	41.79	47.22	33.33	4.45	−61.11	−36.67	14.29
	加权值	11.93	5.69	5.32	7.80	20.94	5.64	1.72	−25.21	−9.53	4.68
	单一绩效	30.74				28.30			−30.06		
股份合作制模式	初始值	62.83	33.33	163.69	100.00	91.91	400.00	14.69	9.09	−9.68	63.29
	加权值	25.97	18.61	17.65	18.67	40.75	67.68	5.69	3.75	−2.52	20.73
	单一绩效	80.90				144.12			21.96		
集体参与模式	初始值	40.12	24.76	114.47	100.00	79.41	16.67	9.07	−115.79	−80.65	46.84
	加权值	16.58	7.23	12.34	18.67	35.21	2.82	3.51	−47.78	−20.96	15.34
	单一绩效	54.82				41.54			−53.40		

从表 4 可见,农地流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权重值为 0.558 4,说明农地流转对转出、转入双方均能够产生明显的效益.根据上述计算结果,经济绩效方面大小依次为:股份合作制模式,集体参与模式和农户自发模式,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率、农地规模经营实现指数指标对经济绩效影响较大.对比几种模式不难看出,专业合作社的成立更有利于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使农地产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农户通过农地作价入股,实现了资本和劳动二者的有机结合,可以持续分享农地流转后的增值收益,实现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弥补了集体参与模式下农户只获取固定租金,难以获得农地增值收益的不足.集体参与模式由于流转年限较长,有利于企业扩大规模经营,农户在获得固定租金的同时,也可以进入当地企业获取一定的劳动报酬.而在农户自发模式下,由于流转期限较短、地块分散,流入方往往不愿追加投资、引入技术、改进种植结构,故难以获得更好的效益.

社会绩效与经济绩效呈现相似结果.这说明对于农户而言,农地作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存在一定的恋土情结,害怕失去农地,而通过股份合作制,农户即保留了原有的农地承包权,又拥有农地作价的股权,其权益得到更多保障,因此该模式能产生更好的社会绩效.而集体参与模式,有利于农地集中规模经营,获取规模效益,但在这种模式下,农户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一旦企业经营出现困境,农民权益无法保障,还有个别企业在获得农地使用权后,改变了原有农地农业用途,破坏了农地农业生产能力.而农户自发模式的社会绩效最低,主要原因是该模式多是口头协议,无法律约束力,盲目的将农地使用权流转出后,后续生活得不到有效保障,衍生出更多的社会问题.

环境绩效与经济、社会绩效的结果不同,股份合作制模式产生的环境绩效为正值,而农户自发模式与集体参与模式却产生了负的环境绩效.这说明股份合作制模式下,随着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会使用更多的有机肥和少量的无公害农药,以保证绿色无公害蔬菜的品质;而其他两种模式,为获得更高的农地产出率,过量的追加化肥、农药的施用量,在获取增产的同时也造成了农地退化,生态环境污染加重,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3.2 综合绩效分析

根据表 4 不同流转模式单一绩效计算结果,进行加权计算得到不同流转模式综合绩效.比较而言,大小顺序为:股份合作制模式综合绩效(84.33),集体参与模式综合绩效(37.37)和农户自发模式综合绩效(22.54).

股份合作制模式综合绩效显著,主要因为股份合作制模式下农户以农地的使用权入股,拥有了货币化的股权,实现了农地资本化流动,有利于扩大其外部规模效应,走专业化、规模化和商品化的道路,使得农地的价值得以保值或增值,农民作为股东,可以持续分享农地的增值收益.但规定的股权是封闭的,股权不得转让、抵押和继承,不利于农地要素的市场化发展,拥有股权的农民不具备对农地的处置权,只享有单纯的收益权,产权关系不完善.如无公害蔬菜和花卉苗木作为唐昌镇与唐元镇两大特色产业,已形成初步规模,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近年来,两镇大力组织专业农业技师、农艺师对村民进行农业产业种植技术培训,病虫害防治培训,蔬菜种植培训和园林培训等.所以该模式主要适用于实施地区具有较好市场前景的农业产业,有较好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技术支持,管理者需具有较高的经营管理能力和市场经济意识.

集体参与模式有利于使分散状态下的农地集中,实现农地规模化、机械化和产业化经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降低生产成本,流转行为规范、期限较长,有利于土壤肥力保持.但从实践经验来看,容易出现掠夺农户权利、与民争利的现象,村集体组织作为中介处于主导地位,将不愿流转的农户采取行政命令强制流转,农民的个人意愿得不到充分尊重.由于农业经营存在较大风险,当农业经营主体出现困境时,容易造成农地经营权和收益权的丧失.如郫筒镇与安德镇地处川西平原的腹心区域,属成都市“半小时经济圈”范围,拥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农民多转移到二、三产业.所以,该模式主要适用于实施地区自然禀赋较好,非农产业较发达,农村劳动力得到有效转移,农户愿意将承包地流转出发展现代农业,实现规模经济.

农户自发模式最大的优点在于体现了农户的自由意愿,操作简单,流转成本较低,但是流转行为不规范,流转期限较短,农地难以集中成片,农地流入方不会加大对农地的投入,经营效益未能得到显著提高.如合作街道距成都市郊约 5 km,地理位置优越,非农产业已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该模式对当地

经济发展水平与自然条件要求较低,主要适用于那些不能较好地实现非农就业但又不想放弃农地承包权的农户,该模式只是农地流转的一种初期过渡模式。

4 结论与讨论

1) 构建农地流转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全面考察农地流转成效的有效途径,有助于鉴定不同流转模式的实践效果。研究区实证分析表明,股份合作制模式的流转绩效最好,其次为集体参与模式和农户自发模式,三者流转绩效存在显著差异,大小依次为:股份合作制模式(84.33),集体参与模式(37.37)和农户自发模式(22.54)。

2) 不同流转模式单一绩效上的差异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不宜忽视。从研究区不同流转模式单一绩效来看,股份制合作制模式最佳,经济、社会、环境绩效均为正值;集体参与模式和农户自发模式的环境绩效均为负值,其中集体参与模式的环境绩效最差;此外,农户自发模式的社会绩效最差。但是,相对而言股份合作制模式对资源要素的要求最高,集体参与模式次之,而农户自发模式则要求最低,故其在农村发展最为普遍。

3) 从 3 种农地流转模式的制度安排以及近年来的实践来看,各种农地流转模式都有其优缺点,不同的农地流转模式具有不同的适用条件。如农户自发流转模式适合于那些非农就业受阻,但农业经营能力有限的农户;股份合作制流转模式需要实施地区有一定的特色优势产业和先进的技术作支撑,有较好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素质的集体组织;集体参与流转模式则适合自然资源禀赋较好、非农产业较发达、大量农村劳动力脱离了农业、农业收入已不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的区域。因此,因地制宜、规范有序、循序渐进、统筹兼顾是推进农地流转、获取绩效最大化的主要策略。

参考文献:

- [1] 刘黎明. 土地资源学 [M]. 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0.
- [2] 张文秀, 李冬梅, 邢殊媛, 等.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11(1): 14—17.
- [3] 毛 飞, 孔祥智. 农村土地流转的政府支持和模式创新——来自重庆市江津区的经验与启示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37(6): 126—131.
- [4] 陈志刚, 曲福田. 农地产权结构与农业绩效: 一个理论框架 [J]. 学术月刊, 2006, (9): 87—92.
- [5] 曹建华, 王红英, 黄小梅. 农村土地流转的供求意愿及其流转效率的评价研究 [J]. 中国土地科学, 2007, 21(5): 54—60.
- [6] 周 滔, 陈 影.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耦合关系研究——以重庆市九龙坡区为例 [J]. 广东农业科学, 2012(1): 203—206.
- [7] 俞 海, 黄季焜, SCOTT ROZELLE, 等. 地权稳定性、土地流转与农地资源持续利用 [J]. 经济研究, 2003(9): 82—95.
- [8] 邵亮亮, 黄季焜. 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及其对农户投资的影响 [J]. 经济学(季刊), 2011, 10(4): 1499—1514.
- [9] 王春超. 农村土地流转、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农民收入增长: 基于中国 17 省份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J]. 农业技术经济, 2011, (1): 93—101.
- [10] 岳意定, 刘莉君. 基于网络层次分析法的农村土地流转经济绩效评价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 36—47.
- [11] 汤惠君, 张效军, 欧阳孔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评价理论与方法——以广东省为例 [J]. 经济地理, 2009(5): 794—798.
- [12] 宁 涛, 杨庆媛, 苏康传, 等. 农村宅基地流转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重庆市 300 户农户调查 [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2, 37(2): 119—125.
- [13] 刘莉君, 岳意定, 谭舒允. 基于经济与社会两个维度的农村土地流转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6): 104—107.
- [14] 张月娥, 杨庆媛, 焦庆东, 等. 重庆市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程度评价 [J]. 西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1, 33(4): 156—161.
- [15] 翟 辉, 杨庆媛, 焦庆东, 等.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1, 36(2): 175—181.

- [16] 杨庆媛, 信桂新, 石彦, 等. 重庆市农地经营的规模问题研究 [J]. 西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9, 31(4): 143—147.
- [17] 龙伟, 郑钦玉, 何艺, 等. 重庆生态城市指标体系的建立及综合评价 [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6, 28(5): 881—885.
- [18] 姜明英, 陈立双. 辽宁省农用地流转绩效评价 [J]. 农业经济, 2012, 103—105.
- [19] 杨逢渤, 李妍均, 杨庆媛, 等. 南川区龙川江流域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研究 [J]. 西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1, 32(11): 104—110.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of Farmland Circul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CHENG Fei^{1,2}, XIN Gui-xin^{1,2},
WEI Chao-fu¹, YANG Chao-xian^{1,2}

1.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6, China;

2. Lan De Research Center of Land Resources Exploiture, Chongqing 400716, China

Abstract: Proper evaluation of different farmland circulation mode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improving farmland circulation system and executing farmland circulation policy. In a study reported in this paper, 10 indicators were selected from economic performanc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farmland circulation to establish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its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and an empirical study was made with Pixian County of Sichuan as the study are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tock cooperative mode gave the best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84.33), followed in sequence by the collective participatory mode (37.37) and the farmers spontaneous mode (22.54). However, based on single performance, the stock cooperative mode was the best, the collective participatory mode was the poorest i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the farmers spontaneous mode was the poorest in social performance. Therefore, each farmland circulation mode has its own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nd in practice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nd the principles of “adjus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proceeding in a normative and orderly way and step by step” and “making overall plans and taking all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adhered to, so a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farmland circulation and maximize its performance.

Key words: farmland circula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mode; Pixian County

责任编辑 陈绍兰

